

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划时代意义

杨宏雨¹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欧洲横空出世,但由于国情和中西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对其一无所知。20世纪初年,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等人零星地向国人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其主张。五四运动以后,相关介绍越来越多,但仍处于零散、不系统的状态。1920年,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译出了首个中译本。陈译本顺应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大的作用。陈译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丰碑,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 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 划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A811. 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5-0050-06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以下如无特别需要,一般简称为《宣言》)横空出世。《宣言》从问世到今天,在17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被认为是全世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文献之一。它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改写了人类历史,影响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语言是思想传播的载体,《宣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德文写成,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先后被翻译成丹麦文、法文、俄文、英文、波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别,加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这些欧洲语言,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一直知之甚少。1920年,29岁的浙江青年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1],译出了《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49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东方最古老的国度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党员总数达9191.4万名。

一、1920年8月以前《共产党宣言》在华传播情况

1848年,《宣言》在欧洲问世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一无所知。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报刊、书籍上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更没有提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

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人颌德原著、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该文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名字,称其为“百工领袖”,并引述了《宣言》中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2][24]}这段话对应的就是今天《宣言》汉译本中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此时,距离《宣言》发表整整过去了51个年头。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蜚仲”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

¹作者简介:杨宏雨(1965-),男,江苏淮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等。

格斯的生平和学说,文中称呼马克思为“马尔克”,恩格斯为“嫣及尔”,把他们合作的《共产党宣言》称为《共产主义宣言》,并说“马尔克之事工,此役为最”,“马尔克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故颂美马尔克,诟病马尔克者,咸是焉归”。^[3]文中还摘译了《宣言》的部分文字和第二章末尾的十项要求。

1906年4月,宋教仁以笔名“犖斋”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文中提及“马尔克 Karl Marx 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4]宋教仁是第一个使用《共产党宣言》这个译名的人。上文摘译的两句话是《宣言》的最后两段。

1906年9月,叶夏声以笔名“梦蝶生”在《民报》第7号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文中称《共产党宣言》为《共产党的宣言》,并介绍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非乌托邦”^[5]。

1907年12月,何震在《天义》报第13、14卷合刊上发表了署名为震述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附录中摘译了《宣言》对资产阶级婚姻制度批判的话语。

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期刊登“民鸣”从日文翻译的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并在译文末尾附言:“《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2]398-399}该报第16-19期连载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

1912年6月,王缙尘把朱执信1906年1月发表于《民报》第2号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部分加以扩充,然后在《新世界》第2期以《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势伸¹译述、煮尘重治作)为题加以发表。在该文的绪论中,他称马克思是“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宣言书》草之者”,并称赞《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2]298}

1912年9月,在《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刊发的幸德秋水著、高劳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文中写道:“自一八四七年麦克斯与其友安格尔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归趣、以呼号万国劳动者之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乎为一个科学之教义,而非旧时空想狂热之比,社会党亦明乎社会为一种有机体,而无复仅从理想以企图改造之者。”^[6]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刊登了成舍我(署名为舍)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部分内容,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摘译)》,并在译者说明中指出:“这个宣言是 Marx 和 Engels 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 1847 年的十一月到 1848 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7]23}

1919年5月,谭平山在《新潮》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文中摘译了《宣言》中的十条要求,并说:“《共产党之宣言书》乃马氏与英智尔(Engels)所共同发表者也。”^[8]

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分4期连载了渊泉(陈溥贤)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大量摘引《宣言》的内容,有些语言表述,与后来陈望道译本中的文字已较为接近。^{[7]24-30}

1919年7月,南陔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会主义之两大派研究》,文中说:“集产主义者较之共产主义,稍形平和者也。……迨马格斯及恩结之《共产党宣言》出世,而后此种主义遂独标一帜,备受各方之攻击。”²

1919年7月,彭一湖在《太平洋》第1卷第12号发表《社会主义论》,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的一段话,

并说“宣言是他(指马克思——引者)一生的主张”。³

1919年8月5日至12月24日,《时事新报》连载河上肇原著,罗琢章、籍碧翻译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文中摘引了不少《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

1919年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论文《社会问题》。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要求。^[9]

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该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收录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凌霜(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刘秉麟《马克思传略》。不少人的文章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引述了其中部分文字。刘秉麟在《马克思传略》一文中介绍《宣言》说,1848年马克思“与至友昂格思应一秘密结社之要求,合刊一《共产党宣言书》传播最广,欧洲各国,均有译本”,“此书可称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圣经。书中之一语,正如枪弹之一射”。⁴

1919年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发表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译文前面介绍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运动时代,德国劳动界有一个团体叫做‘共产者同盟’,这篇《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党纲,起草的人除鼎鼎大名的马克思外,还有他的好友昂格斯。这篇宣言就发表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虽说年代已远,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包含了不少。”⁵同月,高一涵在《太平洋》第2卷第1号发表《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文中说:“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看作阶级斗争的影子。先前的历史都是有势力的人有钱财的人欺压没有势力没有钱财的人的历史,所以他主张社会革命,想叫穷人出来当权。他在七十几年前,已经发了一个《共产派的宣言》,宣言书中的条件,很可以代表马克思生平的主张。”⁶文章也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要求。

1919年12月,胡汉民在《建设》第1卷第5号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摘录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部分内容。^{[7]156-157}

1920年1月,由威廉·李卜克里希原著、戴季陶译注的《马克思传》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登出。文中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实在是近代劳动运动的基础”,“平民思想行动的指南针,又是他们战略和信条的根本义”。“纵使马克思和因格尔两个人,除了做这篇宣言书而外,一样事情也不做,他们也能得不朽之名,是无可疑的。”^[10]同月,《解放与改造》刊载筑山醉翁的《社会主义简明史》,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要求。

1920年4月,邵振青主编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介绍说,《共产党宣言》包括序言和四章内容,并大略地介绍了四章的主要内容。书中评论说,“自有此宣言,世界劳动者运动,遂至别开生面,其影响之大,固不待言”,“共产主义之公然表示于世界者自此始”。⁷

1920年8月,林云陔在《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阶级斗争之研究》,摘译了恩格斯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不论何时代,社会机关无不依其时之经济状况与经济变迁而成立。自经过原始社会之后,历史中无不有役人者与被役者、治人者与被治者之互相斗争。此阶级斗争之历史,已成为一种进化之程序。今之时期,一般普通工人对于受中流社会之压迫,无不思乘时而解其束缚,故不免有阶级之斗争。”

以上就是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以前《共产党宣言》在国内传播的大致情况。这些介绍有很明显的三个特征:1)高度称颂《宣言》的伟大意义;2)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十条要求的人特别多;3)不少人摘引宣言中的部分内容,少数人尝试节译《宣言》或翻译《宣言》的第一章。

这些片段，晦涩古奥，有时甚至夹杂着错误的介绍，激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好奇与期盼。陈译《共产党宣言》的问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个承接与推进作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陈望道苦译《共产党宣言》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了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第一个胜利。半年以后，时年29岁的东方青年李大钊就大胆地断言：“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1]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6月5日，上海工人为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举行罢工，随后全国多地掀起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工人阶级强有力的支持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上海“六五”工人罢工以后，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意识到中国“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12]，为此他们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研究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为主旨的《星期评论》。该刊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发行量达3万多份，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⁸。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是一个激进青年（戴季陶生于1891年，1919年只有28岁），对马克思非常崇拜，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13]他先后在《星期评论》《建设》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据统计，仅在《星期评论》，戴季陶就在15篇文章中提及马克思127次、恩格斯24次、马克思主义22次，是《星期评论》上介绍、评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文章最多的人。^[14]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获得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宣言》，他熟稔日文，很想自己把这本《宣言》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因为翻译这部巨著难度极大，加上事务繁多，最终不得不放弃自译的打算。正当戴季陶为翻译《宣言》发愁时，时任《民国日报》经理的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并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1915—191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在日期间，陈望道为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吸引，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就职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提倡妇女解放，和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一起被一师师生们尊称为“四大金刚”。

《宣言》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翻译这部经典著作绝非一桩易事。连《宣言》的著作者之一恩格斯本人都承认“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15]46}，“《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15]361}1920年初，29岁的陈望道着手翻译《宣言》。他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宣言》为底本，同时参考英文版，字斟句酌，力求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水准。为了专心致志，避免外界的干扰，陈望道把工作地点选在义乌老家那间僻静的柴房里。翻译工作异常艰辛，有时一天也译不了几个字，有时想表达点什么，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字词。一天接着一天，一晚接着一晚，稿子上的字多起来，陈望道却日渐消瘦下去。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太过忘我工作，以至在吃粽子时误蘸墨汁，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被誉为“真理的味道”。1920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陈望道终于用中文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这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宣言》译好之时，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因各种原因已经停刊，因此，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的计划落空。1920年8月，陈望道的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正式出版，由当时秘密成立的又新印刷所承印，初版1000册。由于排版疏忽，初版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再版时改正了书名，封面马克思的肖像从原来的红色改为蓝色。陈译《宣言》出版后供不应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到1926年，先后再版17次，累计达10万册以上。

三、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划时代意义

陈译《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陈译本是《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⁹此前无论是朱执信、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刘师培、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李大钊、陈启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宣言》的介绍都是零星、片段的，是服务于其文章需要的。这些挂一漏十的介绍，或包含错误，或诘屈聱牙，如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把马克思错成了英国人，朱执信用“株主”表达“股东”之意，对《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翻译竟是“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显然，依靠这些一鳞半爪的介绍不可能对《宣言》登堂窥奥，更不可能满足中国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对先进理论的要求。

陈望道的中译本在汲取前人翻译成果的基础上，用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白话文译述。译文大量采用了“底”和“的”字作为助词，“之乎者也”之类文言虚词几乎全部消失，对于一些新名词如自由民、贵族、骑士等，在名词后面用括号附上英文，这样既有利于传播，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中西文化差别造成的歧义。陈译本还使用了诸如“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褻”；“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这类文学性语言，更使译文显得优美、飘逸。陈望道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语言学造诣，《宣言》译本语意流畅，内容精准，因此，陈译本出版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人再去试译，直到1930年，华岗才翻译了《宣言》的第二个中译本。1949年以前，除陈望道的译本外，国内先后出版过四个译本——1930年3月华岗译本，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这些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过陈望道的译文。

陈译本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但谁都不能否认，汉语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母语，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除少数精英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外语，无论是日语、英语还是德语、法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让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革命导师说中国话。换言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陈译本以浅近、优雅的白话文为载体，深入浅出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这部匠心独运的不朽之作，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无数爱国志士在陈译本的引导下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1920年，周恩来阅读了陈译《共产党宣言》后，更坚定了其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信仰。后来他远赴法国，继续深入学习，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刘少奇则曾经在外语学社聆听过陈望道讲授《宣言》课程，并切实受其影响，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译《宣言》，也是朱德入党的引路读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经说过，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是使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一位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籍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16]对于基本上不懂外语的毛泽东而言，中译本就是他获取知识和智慧的宝库。

陈译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1920年5-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上海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11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把这个文献和陈译《宣言》相对比，不难看出，该文献是在学习和研究了陈译《宣言》之后的产物。陈译《宣言》在1920年8-9月间连印2次，数量达2000册，并很快行销一空，对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建立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中共第一批党员大多有过阅读陈译《宣言》的经历。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成立被誉为“开天辟地大事变”，在中共成立之前出版的陈译《共产党宣言》无疑就是一把开天辟地的利斧。

1933年，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评价李大钊的文章说：“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17]。这个评价同样也适用于陈望道的《宣言》中译本。陈译本用今天的眼光看，固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1920年，年仅29岁的陈望道“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鲁迅语）。陈译《宣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玄庐. 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N]. 民国日报·觉悟, 1920-09-30.
- [2] 高军.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3] 朱执信. 德意志革命家列传[M]//朱执信集: 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 15-16.
- [4] 宋教仁.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M]//宋教仁集: 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1.
- [5] 叶夏声. 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M]//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398-399.
- [6] 幸德秋水. 社会主义神髓[J]. 高劳, 译. 东方杂志, 1912, 9(3).
- [7] 吕延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 上[M].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6: 23.
- [8] 谭平山. “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M]//谭平山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41.
- [9] 张闻天. 社会问题[M]//张闻天文集: 1.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10.
- [10] 威廉·里布列希. 马克思传[N]. 季陶, 译. 星期评论, 1920-01-03(02).
- [11] 李大钊.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J]. 言治, 1918(3).
- [12] 季陶. 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N]. 星期评论, 1919-06-22.
- [13] 季陶. “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N]. 星期评论, 1919-09-28.
- [14] 杨宏雨. 《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介绍[J]. 学术界, 2019(6): 138-153.
- [15] 恩格斯. 致劳拉·拉法格[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16] 陈晋.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上[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42-243.
- [17] 鲁迅. 《守常全集》题记[M]//鲁迅全集: 2卷.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331.

注释:

1 该报把朱执信的笔名“蛰伸”误排成了“势伸”。

2②③④⑤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 上. 1985年, 第160、165、213、218、221页。

3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上. 1985年, 第252页。

4 详见《介绍新刊》,《教育潮》第3期,1919年8月出版。

5 根据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期的广告,似乎当时刘师培等无政府者曾在日本组织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但迄今未见实物,可能仅是打算,并未译出。